

商文化如何一步步影响古蜀文明？

唐际根教授趣解三星堆

曾经我们认为，三星堆与世隔绝，对它进行了各种猜测。随着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发现，三星堆正在揭开神秘面纱。许多新材料证实，三星堆与中原以及长江中游有着密切联系。但进一步说，三星堆具体如何受到影响，技术又是如何一步步进入四川盆地的呢？9月12日，名人大讲堂·古蜀文明季第二讲在成都的阿来书房开讲，唐际根教授以《尊彝之路——公元前16-11世纪长江与黄河间的文明互鉴》为题，为线上线下观众清晰地梳理了这个问题。

唐际根是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，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，对中国青铜发展的格局和态势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。也正是因为原殷墟考古队长这一身份，让唐际根习惯于站在商王朝的青铜角度来看三星堆，他发现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。

从黄河到长江 商文化如何影响古蜀？

讲座开场不久，唐际根讲述了一则有趣的故事。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台家寺遗址出土了一些陶片，邀请他前往调研，“我当时从涇北商城遗址的工作地开车到安徽，进去一看，发现和我在商城发掘到的标本是如此相像，几乎没有区别。我跟他们开玩笑说，这不就是我挖出来的东西么！”

涇北商城在黄河流域，台家寺遗址属于江淮地区。黄河流域发掘的器物为何与南方如此相似？唐际根认为，很可能是商朝人直接到了江淮一带。通过这则小故事，唐际根想引发出的是商王朝的文化扩张。

“在公元前16到11世纪的近五百年时间，商王朝政治、文化上向四方扩张，往南到达长江中游地带后，又以此为基地，把这些文化影响推向长江上游，影响了三星堆文化。这就是制度与技术的‘南来西往’。”

唐际根认为，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中游再到长江上游，在这将近五百年漫长的



9月12日，唐际根教授开讲《尊彝之路——公元前16-11世纪长江与黄河间的文化互鉴》。

时段中，中国大地发生了一次深刻的文化交互和交融现象。

唐际根教授首先为观众梳理了公元前16到15世纪技术和制度的南来，也就是商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。他逐一展示了在江淮区域、皖南、鄂东南、鄱阳湖赣江等区域出土的青铜器，它们有着非常多的相同特征，也与商代青铜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。唐际根指出，大量材料显示，这个时期的长江中游已经高度接受了商王朝的文化。

一切都有迹可循。例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中记载：“有人方齿虎尾，名曰祖状之尸。”在江西的“虎国”，就发现了与虎有关的青铜器物，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，也出现了“虎方”的记录。“江西这个地方出土的31件青铜鼎上，有16件鼎的耳朵上都有老虎。”唐际根认为，这至少证明，“虎国”的确是独立的政治体，但它深刻地接受了商文化，南北的沟通是很通畅的。

唐际根还带来了最新考古材料。在殷墟旁边的体育中心墓地，考古发掘了许多带有铭文“冉”的青铜器，这是位于河南安阳的一个族群，但相同族徽也出现在湖南。“这说明在商晚期，中原和长江中游的湘江流域也有着密切关系。”

“基本态势就是公元前16世纪开始，

商文化一路向南扩张，先在长江中游形成一堡垒，很强势，包括技术和制度等等，随后又从长江中游进一步西进，来到四川，影响三星堆文化。”唐际根总结道。

尊彝之路 三星堆在文化上的自我坚持

唐际根将本场讲座命名为“尊彝之路”，这是他与另一名考古学家张昌平教授不约而同提出的文化概念。

“既然我们知道商文化对三星堆产生了影响，商文化里有这么多器型的青铜器，三星堆为何唯独钟爱尊和彝这两种类型呢？”唐际根抛出悬念。

他向观众展示了一套商代的酒器，各式各样琳琅满目，今天我们也能够在长江中游的一些文化遗址中看到其中的大部分。但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里，却以尊和彝为主，这两种都是具有储酒功能的器物。而饮酒器、盛酒器、调酒器这些与饮酒行为密切相关的器物，却没有被三星堆选择。

“三星堆对中原到来的文化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他们挑选了尊和彝，用来搬运和储存酒，这就是文化的选择。”唐际根说。

同时，唐际根还提到三星堆与中原

文化的另一个不同点。那就是三星堆是商晚期的文明，但它传承的铸造技术却是商早中期的。在讲座一开始，他便有意埋下伏笔，让观众记住三星堆青铜器上的三道玄纹。讲座临近结束时，观众已经了解商文化的传播路径，再回头看这三道纹路却发现，在商早期的殷墟器物上有这样的纹路，但在晚期的殷墟青铜器上，类似的纹路已经消失了。

“为什么？因为商文化是先到长江中游，再辗转西进影响三星堆的。打个比方，在商晚期，殷墟已经开始流行彩色电视了，而通过长江中游带来的文化有延迟，三星堆就还在用黑白电视，所以还在制作有三道纹路的‘过时’样式。”唐际根说。

严谨又风趣 考古讲座不再艰涩

虽然是严肃深奥的专业考古讲座，但唐际根教授的讲课方式不失风趣幽默，同时还带来了不少最新的材料，有些甚至还未进行发表。不仅让普通观众大开眼界，也让许多考古文博学生受益匪浅。“兼具通俗性与专业性”“干货满满”，观众如此评价。

例如他讲到，此前考古学者为了表达严谨，对三星堆埋藏坑的命名有着不同见解。“若直接说‘祭祀坑’，就是明确认为它的作用是用来祭祀，这就有了立场，有些学者很严谨，就不赞同，建议用‘埋藏坑’。还有学者提出，不如直接用‘坑’，可能更加不会出错。”诙谐的讲述引得现场观众会心一笑，艰涩的考古顿时生动起来。

再如提到商代“冉”字族徽一处，他则故意“卖关子”，引发线上线下观众的强烈兴趣，“注意了，如果你是专业的学生或学者，可能本场讲座你最受刺激的時刻到了，因为我在这里讲的，是最新的材料。这个材料还没正式发表，我们先在这里公开一下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陈羽啸

名家会客厅·对谈

唐际根解读三星堆玉石器“生产车间”

看到玉器的不同阶段，对理解玉器非常重要

堪称旷世神品的精美青铜器、前所未见的稀世金器、雕刻有繁复纹饰的象牙器……数年前，“再醒惊天下”的三星堆遗址，带给世人无数惊喜。而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器物中，青铜神树、青铜纵目面具、青铜神坛、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……这些造型独特、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更是广受关注。但将目光放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尊、青铜彝上，它们身上所承载的南北文化交流互鉴的证据，更不应被忽略。

在名人大讲堂“名家会客厅”环节，唐际根教授向观众分享了他与三星堆的特殊缘分，以及他对三星堆重磅新发现——玉石器作坊背后文化现象的理解。

初遇三星堆 “看到了非常震撼的青铜器”

唐际根与三星堆的“缘分”不浅，在“名家会客厅”，唐际根谈及自己与三星堆遗址的“初识”。原来早在30多年前，唐际根就来过广汉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现场，他被出土文物深深地惊艳到了。

“三星堆遗址一、二号祭祀坑的发掘，是由两位陈先生进行的，分别是陈德



唐际根教授做客名家会客厅。

安、陈显丹。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，出差之后来到这边，但最初没有直接到考古现场。等到1989年又来到了鸭子河畔，这次到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现场，也去了当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，看到了那些令人非常震撼的青铜器。”

唐际根回忆，1986年，三星堆一、二号祭祀坑先后被发现，发掘出土了青铜器、金器、玉器等珍贵文物，在学术界立刻引起巨大轰动，可谓“沉睡数千年，一

醒惊天下”。“我记得当时的新闻报道，真的是‘轰炸’一般，媒体天天报道的都是三星堆，所以我印象特别深。后来现场亲眼所见更是震撼，惊叹我国西南地区竟然还有这样一批文物。”唐际根说。

畅谈新发现 “对于我们理解玉器十分重要”

2024年7月，三星堆遗址考古又有新的重磅消息传来。遗址新发现与玉石器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，专家初步判断为

玉石器“生产车间”，年代为商代中期，距今约3500年至3400年。讲座中，唐际根也谈到了这一最新发现，表示自己也去过考古现场。

“我刚好近距离地看了这些东西。玉，是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。从古到今，中国人都喜欢玉。在商代，南北方都有玉器。因为玉器的选材、加工、成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我们一旦发现其中一个加工环节，那就是重大的发现。”

新发现的玉石器“生产车间”位于三星堆8个祭祀坑以北约一公里处，距离1927年三星堆首次被发现的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直线距离不到100米。新出土的文物，包括玉石器原料、坯料、废料、残片、成品，形成了早期手工业较为完整的生产链条，初步判断新发现为玉石器作坊。

“可以看到玉石上有明显的打磨痕迹，相当于半成品，成品我们也已经见到了。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玉器不同阶段的样子，这对于理解玉器是非常重要的。”唐际根说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陈羽啸